

老年生活报



老年生活报

全国助老服务热线
0532-66610000

30年后再相逢，老战友含泪相拥

本报报道让两位老人再续友情



陈鸣盛(左)与张毓生

本报讯 因着本报的一篇报道，失散了三十多年的老战友终于得以“团圆”。3月25日，87岁的读者陈鸣盛向记者分享了这个“好消息”。当日下午，记者赶到他居住的青岛光大汇晨养老院，详细了解了这段难忘的战友情。

2月7日，本报头版“封面老宝贝”的系列报道中，陈鸣盛位列其一。此时，有一位80岁的读者

张毓生被这篇报道深深吸引，他想确认陈鸣盛是否就是他多年来日思夜想的老战友。于是，他按图索骥，通过报道中提及的老年公寓名称，找到了陈鸣盛。当两人接通电话并确认后，商定了见面时间。“昨天他来了之后，一见我就哭了，我也哭了，陪他来的女儿也哭了，我们三个人抱在一起都哭了。”陈鸣盛告诉记者，他与张毓生既是老战友，又是好朋友，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，断联了三十多年。

陈鸣盛与张毓生年轻时在同一个军舰上服役。那时的陈鸣盛是“航海长”，张毓生是“枪炮长”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两人共同且多次参加了海陆空大型演习。演习中遇到过各种“风浪”，在紧急关头，陈鸣盛曾以丰富的航海经验让张毓生脱

离了险境。就这样，两人在演习的生死战场上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训练场上，他们是战友；训练场外，他们是朋友。那时的张毓生谈恋爱遇到“瓶颈”，不知如何是好时，陈鸣盛鼓励他“最关键的是你看没看好她，其他的都是小事”。在陈鸣盛的鼓励下，张毓生和女友喜结良缘。

转业到地方后，两人刚开始还有联系。后来有一次陈鸣盛打电话给张毓生，发觉对方的语气显得有些“不耐烦”，他怀疑“战友的感情是不是有变化了”，于是就没再继续与张毓生联络。殊不知，那时的张毓生患病，说话不利索。就这样，两人友谊的小船不知不觉“像是翻了似的”，直到这次重逢才揭开了迷雾。

原来，张毓生心里一直牵挂着陈鸣盛。有一

天，张毓生独自去印象中陈鸣盛转业后的工作地点找陈鸣盛，但迷了路，直到很晚了也没回家。这让孩子们非常担忧，无奈之下打了110报警。当警察找到张毓生时，他嘴里不停地呼喊“老陈、老陈……”时隔多年，当陈鸣盛此次见到张毓生，了解了实际情况后，他禁不住泪如雨下，“我误会他了。”

虽然张毓生患过脑梗，说话不清楚，但当他一进门见到陈鸣盛时，一眼就认出了老战友，并与老战友紧紧相拥在一起。“我说你是不是毓生？他使劲点头。我也忍不住哭了。”陈鸣盛回忆起两人的故事，一再强调，“我有困难，他帮我。他有困难，我帮他。在重大的人生观念上，我们思想一致，是难能可贵的好朋友！没想到你们的报道起了这么大的作用，太感谢了！”（记者 王丽洁）

民政部：
康复辅具租赁试点
累计投入5.86亿元

本报北京讯 为了让更多有需求的群体能够用得起、用得上康复辅具，2019年起，民政部等七部门先后在全国35个试点地区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试点。截至目前，35个试点地区已累计投入5.86亿元，服务累计91.68万人次。

下一步，民政部将同有关部门研究建立国家康复辅助器具产品服务信息平台，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康复辅助器具区域综合服务中心，提供展示、科普、评估、配置、租售等一站式综合服务。推动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目录，使其成为养老助残和大健康领域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佳凌表示，下一步将加强租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，提高辅具人才队伍专业化、规范化服务水平。（李玉梅）

全国首批养老护理专业技术人才出炉

本报讯 日前，江苏省正式公布该省养老护理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，全省也是全国首批168名养老护理专业技术人才出炉，包括初级、中级、副高级三个层次。

随着养老服务体系的日益健全和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，广大老年人的服务需求更趋专业化、精细化、个性化，对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、专业背景、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。同时，由于之前养老服务领域没有专门的职称门类，人才流失率高。

北京大学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陆杰华指出，江苏的相关经验可以借鉴和推广。还可以在很多方面细化：对应职称的奖励和津贴怎样完善，跨部门流动的职称认定，跨地区的职称认定是否可行等。（苏新）

一个律师见证反家暴20年

够帮助她争取本应属于自己的那份。

“谢木兰净身出户，以近乎自毁的姿态换取了自由。”李莹感慨，在她经手的很多案件中，受害者为了摆脱暴力，宁愿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，财产让步，孩子抚养权也让步。

突然的撤诉

2016年的一天，李莹的热线接到李凌霄的求助电话。这是一位同样被家暴了40年的妇女。

李莹团队沟通妇联为其提供帮助，李凌霄住进了家暴受害人庇护所。这是我国反家庭暴力法确立的一项重要的处置机制，主要功能是给家暴受害人提供一个安全的生活场所。

李莹团队代理李凌霄向法院起诉，提交证据，坚决要求离婚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此案后来急转直下。由于其丈夫生病住院几个月，庭审暂停，在此期间，李凌霄一直在医院照顾他。一

个星期后，李莹接到了李凌霄的电话：“特别抱歉，我还是想撤诉了。毕竟是孩子的爸爸，我不忍心不管他。”她补充道：“他说以后家里的钱都由我来管。”

李莹分析，管钱这件事对李凌霄来说很重要，因为40年来她在家中从没有享受过主导和掌控的感觉。

“我们常认为暴力越严重，反抗就会越激烈，但是家暴案例中，往往受害者结婚时间越长，家暴时间越长，越难离开。”李莹说。

受害者需要系统性支持

家暴受害者面临的客观困境包括文化的约束，很多人认为家暴是“家丑”，会产生耻感；或者担心离婚后子女受到歧视；也包括经济上的困境，很多受暴人收入不高，甚至没有收入，没有办法单独抚养子女；此外还有社会因素，比如有的地方公权力介入乏力，社会支持系统不足，让受害人有一种无助感和孤独感。

但心理上的困境是家庭暴力的特征之一，也是处理家暴的难点。这种心理状态的主要表现首先是习得性无助，长期遭受暴力而无法摆脱，会让她们丧失自信，产生无助感，从而会顺从、认命。另一方面，她们会产生恐惧、焦虑的情绪，害怕对方会给自己更大的伤害。不少家暴受害人提出离婚后，被施暴人继续以暴力相威胁。

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对这类暴力事件有一定的规制作用。在李莹团队的实践中，签发后被违反的很少，“基本不敢再打了，说明它是有威慑力的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观念的转变，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签发正逐步向好的方向发展。一方面是签发率在逐步提高。另一方面则是签发的时间越来越短。

“家暴受害者需要的并不单是法律援助，而是整个系统性的支持。”李莹说。

刘言

为离婚净身出户

10年前，李莹收到谢木兰寄来的第一封信。丈夫经常对她非打即骂，喝了酒下手更狠。她一直有离婚的念头，那时候孩子还小，没法离。直到她养育大了儿女，带大了孙子，觉得“终于可以为自己活一次”。

2006年，年过60岁的谢木兰第一次提起诉讼离婚。但男方不同意，法院没判离。谢木兰选择了离家出走，2013年，她再次起诉离婚，官司拖了一年多。对方表示可以离婚，但她要净身出户。

偶然听到李莹做的反家暴节目，谢木兰开始重新思考这个问题，希望法律能